

王若飛在獄中

楊植霖 喬明甫 薄一波 著

王若飛在獄中

楊植霖 喬明甫 薄一波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王若飞在狱中

杨植霖 乔明甫 薄一波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5.25印张 106千字

196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6年9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 0—25000册

ISBN7-5006-0405-x/K·46 定价：5.30元

30	人生森林——于东侠
50	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
80	限告之祭李向
目次	限告之祭李向
11	林野的春天

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	1
豪迈的歌声	1
密谈	5
草原星火	9
搏斗	13
宁死不屈	17
在敌人的法庭上	24
铁窗内外	29
钢铁的心	34
诲人不倦	42
用笔杆子战斗	50
铁窗怒吼	60
熔炉	66
痛斥典狱官	75
三毛入党	80
战胜瘟疫	87
批判黄平叛变	93

狱外弟子——杨森老人	96
临别赠言	102
向李培之告别	106
从归绥到太原	110
永远学习的榜样	114

若飞同志在太原狱中	乔明甫 119
新来的“政治犯”	119
组织与团结	121
锻炼与学习	124
密切联系群众	128
领导绝食斗争	131
西安事变	141
出狱	143
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	薄一波 151

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

杨植霖

豪迈的歌声

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刚回归绥^①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

特务们把我押送到归绥市牛桥（庆凯桥）东北方的“第一模范监狱”，单独地关在一间牢房里。跨进牢门，觉得有一股阴森发霉的气息，直灌进我的肺腑。当我回头再看时，铁门在背后“啪”一声落锁了。漆黑的房间里，阴郁而潮湿，只有一小片光亮，从一尺见方的铁窗里射进来。我屏着气，定定心，向周围打量了一番：这个囚室，高不满七尺，长七尺，宽五尺，简直像个坟墓。

从窗口望出去，对面的牢房遮住了视线。在每个窗口和铁栏后面，都会看到瘦骨嶙峋的影子和焦黑的枯黄的面孔。日子久了，我才知道，监狱的北面是天主教堂，东面是城隍庙——那里设有绞刑架。常常是当教堂的钟声“当——当——”响起时，判了死刑的犯人，被拉到十殿阎君脚下，送掉性命。

^① 归绥，即现在呼和浩特市。

我们共产党人，对阶级敌人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当敌人还没抓住任何证据时，我们一定要为争取出狱而斗争。我是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抓来的。从被捕那天起，就和外界隔绝了音讯。我每天都在悬念另几个被捕同志的命运，同时，也时刻准备着迎接敌人的“提审”。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是深秋了。塞外的天气慢慢冷起来。我们同时被捕的几个同志，经过侦讯之后，没发现什么新的材料，都被关在一起了。当我们紧张的心情稍微松弛时，突然发觉：看守们的脸色又变得冷酷了。只见他们的神色惊惶失措，看见我们这些“政治犯”，正眼也不敢望一下，就赶紧躲开。我们常说：看守的脸色是寒暑表。从看守们的行动看来，也许我们的案情又严重了，说不定哪一天，敌人要把我们推上断头台。

入狱以后，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做工作。有个出身贫苦的老看守，有时，也帮我们偷偷地送信、买东西。一天，“放风”^①时，我瞅个空子，挨近那个老看守，向他打听：“最近你们慌里慌张，狱里又出了什么事？”老看守悄声说：“听说你们外头的人可多哩，前几天，在包头又捉住了一个大共产党，刚刚解来。”我心里不由得震了一下：“一个大共产党员，这是谁呢？”回到牢房，问起另几个同志，他们也说不知道。

一个秋色淡淡的下午，西斜的太阳，照射着小小的囚窗，囚房里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当我靠近囚窗，领受这难得的阳光时，突然，从前面的牢房里传来低沉而压抑的歌声：

① 监狱里每天两次，把囚人放出来几分钟，让他们大小便，叫做“放风”。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听，这分明是《国际歌》，多么豪迈，多么雄壮，多么激动人心！顿时，像有一道更强烈的阳光，射进我们的囚室。我把脸颊紧贴着冰冷的铁窗，望着对面的囚室，看见往日那些阴郁的面容上，豁然开朗，露出昂扬的情绪。过道上的几个看守，也停住了脚，瞪着大眼在谛听。同室的一个同志，从木炕上跳下来，抓住我的膀子，摇晃着，兴奋地叫着：“老杨，《国际歌》，《国际歌》！”他的喊声，把过道上的看守惊醒了，一个看守跑过来，朝我们的囚室叫着：“喊什么？低声些！”

我很奇怪，这个歌唱的人到底是谁呢？要不是镣铐加身，要不是被关在这个斗室里，我们也要围起来，纵情歌唱了。

我实在憋不住内心的激动，一看那个老看守，正从那里走过，我就向他招招手，低声地问：“喂，喂，这是谁在唱啊？”

老看守没等我讲完，连脸都吓白了。他的如狼似虎的同伴们，正提着鞭子，注视着各个牢房，找寻发威的对象。他要和我们一交谈，被同伴们看到了，在典狱长面前一告密，少不了也要遭受一顿毒打。老看守向站在远处的几个看守瞥了一眼，匆忙地朝我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看守的举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越发想知道这个歌唱者的情况。一天，乘周围没人时，我又问那个老看守。起先，他怎么也不说。我向他保证，绝不会连累他。他望望附近的确没人，才悄悄对我说：

“歌唱的人，就是那个大共产党啊！你不知道，这个人胆

子可大啦！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宣传说：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这都不说，他骂蒋……蒋介石是个大卖国贼……嘿，这个人可真是条好汉子！”

我急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听说叫黄敬斋！”老看守又张望了一下，压低声音说：“黄敬斋刚押来那天，把典狱长可真忙坏了……”接着，他还讲起典狱长韩渐逵怎样亲自训话布置，怎样禁止讲出黄敬斋的事，更不许把黄敬斋的行动告诉“打共产党官司”的人。在韩渐逵眼里，要是黄敬斋的事一被大家知道，就会“串供”，就会增加反抗力量，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惟恐看守们不听他的话，又特意挖空心思，把共产党描绘一番，说共产党多么可怕，说共产党像油一样，谁一接近，就给谁沾一身“共产油”。特别是这个大共产党员，“共产油”更多，简直碰都碰不得。

“你觉得他讲得对吗？”我插问了一句。

老看守说：“端着人家饭碗，又怎敢不听啊！至于‘共产油’会不会沾在身上，这还是小事，要是叫典狱长发现我和你们接近，轻则四十大板，再不然连这个破饭碗也给敲掉了。丢掉饭碗谁不怕啊！”

老看守讲到这里，又向四下扫视一眼，悄悄问我们：“他到底唱的是什​​么呀？”

我就告诉他，这个歌叫做《国际歌》，歌词大意是号召全世界穷人，争取解放，翻身作主，不再做奴隶。老看守听着，不住地点头，我解释完了，又微笑地问他：“这可就是‘共产油’啊，你看看身上，沾上了这种油没有？”

老看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略显惶惑地说：“我又不是大

肚子资本家，为什么要怕这种‘油’呢？我这半截入土的人啦，为儿女攒不下家当，还要给自己积点阴德哩！”

密 谈

从老看守嘴里，我们知道了这个被捕的同志，名叫黄敬斋。可是，黄敬斋又是谁呢？他怎样被捕的？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时，我们的案子快要判决了，我们很想和他联系，听听他的意见，可是，他是被独囚的，监狱里又看管得很严，一直得不到机会。

这所监狱，有四个号子，名曰“改”“过”“迁”“善”。每个号子分两廊，上有顶盖，内有十几间相对称的小囚室。四个号连在一起，中央有个高楼，可直通各个号里。押来的犯人，该送到哪个号子，是以案情轻重作决定的。案情严重的多囚在“改”字号，快出狱的犯人大多囚在“善”字号。黄敬斋被囚在“改”字号。我们被囚在“迁”字号。当中虽然只隔着个“过”字号牢房，却像隔着一重山那样遥远。

革命者的心是紧相连的。黄敬斋的歌声，能穿过板壁，越过高墙，鼓舞了整个监狱的难友，难道我们就无法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和他取得联系吗？

打定主意之后，每逢“放风”的时候，我就赶紧跑出去，在走廊尽头，注视着“改”字号进出的难友。一天，我终于看到从那个牢房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白净面孔，脚上带着铁镣，迈着艰难的步伐，朝厕所走去。我瞥了老看守一眼，老看守低声说：“这就是歌唱的那个人。”我心里一

喜，紧走了几步，赶到厕所门口，想向他打个招呼，出乎意料地，他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一声不吭，就转过身去，躲开了我。

回到牢房后，我反复思索，不了解他为什么待人这样冷漠。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就请一个做苦工的难友，代我们向他问好。那个难友，扫着地，溜过去，扒在他的窗前，小声说：“黄先生，那几个学生向您问好。”他问扫地的难友：“那几个学生子是什么案子？”难友向他说明我们都是“共产党嫌疑犯”。他又问：“这些人判决了没有？”难友说：“没有。”他立即接着说：“请你转告他们：我很好，并向他们问好。目前，要他们还是集中精力准备提审。”

做苦工的难友把话转告了我们。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以后的日子，每逢“放风”时，我们仍旧远远地向他示意致敬，他还是装作没看见，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的案子终于被判决了，我被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拿着判决书，我又气又恼，打算上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可是，怎么办呢？平常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怎样才能得到他更多的帮助呢？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典狱长韩渐逵要向狱犯“训话”，要我们都到那个四面通风的讲堂里去。我把“判决书”揣在怀里，走进讲堂，四面逡巡着，找寻黄敬斋的位置。讲堂的座位，就是在地下埋几根木桩，上面钉一块烂木板，或者一根弯弯曲曲的木椽，当作板凳。狱犯们挨个儿坐到前边去。黄敬斋走进来，在最后一排找了

个木椽坐下了。我故意磨蹭着，让身边的人挤到前边去，自己拉在后面，坐到黄敬斋旁边。

韩渐逵开讲了。这个家伙是个佛教徒，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平常什么书也不让我们看，甚至连《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在被禁之列。他说，看了《三国》学诡诈，看了《水浒》好打架。他给我们指定的书是文昌帝君功过格、老子的《道德经》、四书五经、《三民主义》之类。他每次的“训话”，总是这些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翻版，并没有其他东西。

当韩渐逵开讲时，我眼睛望着前边，嘴巴朝着黄敬斋，小声地说：“你好吧，老黄。”

黄敬斋“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会，我望望两边的人，他们的眼睛都瞅着前边，没有注意我们，就又低声说：“老黄，我们判决了。”

这次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强烈，黄敬斋听说我们判决了，立即问我：“你判了几年？”

我说：“二年半。”说着，我从怀里掏出“判决书”，递给了他。他很快地看了一遍，把“判决书”还给我，对我说：“这很好。有了期限，就可作出去的打算了。”

我说：“不，我不服，我要上诉。光凭‘嫌疑犯’三个字，就给人判刑，这算什么法？”

黄敬斋按住我的手，平静地说：“不要这样。在反动统治下，到处都是一样。你不服，上诉，它的公事给你转来转去，谁受得了！听说过去往南京上诉，顶少需要一年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你这一年不是又白坐了。何况能否轻判也还说不定，又何必再去找麻烦呢！”

我静心地听着，不时地注意着韩渐逵的神色，这时韩渐逵正弓着腰，在洋洋得意地说教。黄敬斋把头伏得更低些，恳切而又热情地说：“要注意，不要露锋芒！要小心隐蔽，要警惕敌人破坏！有些人，以为判决了，就万事大吉，放松了警惕，说话不小心，结果还要吃亏。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地宣扬共产主义。你们不同，你们只是‘嫌疑犯’，讲话要谨慎些，不要‘我们长、我们短的’，这对工作并没有好处……”

他的一席话，句句打进我的心坎，像师长那样关切，像慈母那样温馨，使我澄清了混乱的思想，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老黄，前些时你不理睬我们，我们对你还挺有意见哩！现在，我们完全明白了。”

黄敬斋微微一笑，亲切地说：

“那时，因为你们还没判决。我不让你们接近，是怕我牵连了你们，使你们的案情复杂化。现在，你们已经判决了，就安心地度过这段艰难的时间吧！监狱是我们的学校，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工作、斗争、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未来的战斗！”

谈到这里，韩渐逵的“训话”也快要结束了。我望望黄敬斋，担心地问：“老黄，你的案子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黄敬斋沉默了一会，望着讲台上的韩渐逵，幽默地说：

“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的斗争，现在还刚刚开始！”

草原星火

在几次听“训”时的交谈中，和后来的不断接触中，我才知道，原来眼前的黄敬斋，就是我们敬爱的王若飞同志。

若飞同志是我们党的最老的同志之一。一九二二年，他在法国留学时，和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罗迈、聂荣臻等同志，成立S.Y.（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出版《少年》《赤光》等刊物，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国内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部分团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Y.遂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若飞同志是负责人之一。他一面做工，一面工作。

在若飞等同志的辛勤工作中，使党在巴黎附近工业区所领导的华工组织，大大地发展了。在这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干部。

一九二三年，若飞同志又转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年代里，若飞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国共产党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大革命失败后，若飞同志组织过苏北地区的秋收起义。一九二八年秋天，若飞同志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选派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一九三一年夏天，因为国内工作上的需要，若飞同志又被调回来。一回国，党就派他到内蒙古地区，开辟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

若飞同志和同行的几个内蒙古同志，分成两路出发，一路

经归绥到河套一带，一路直趋阿拉善旗定远营。事先约好，若飞同志把河套一带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再到定远营会合。

若飞同志化名“黄敬斋”，扮成商人模样，由一个蒙族“交通”领着，进入内蒙古地区。八月的草原，在灼热的太阳下，闪着金光。穷困的牧民，皱着眉，放牧着牛羊。驼队的铃铛声，在沙漠上荡漾，驼背上不是投机商人，就是国民党士兵，有时还会碰到潜入草原的日本小胡子。若飞同志满怀激愤的心情，沿途进行调查研究。从牧民、农民和年轻“交通”的口中，他知道了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反动势力又嚣张起来。土豪劣绅，乘一九二八年大旱之后，廉价收买农民的土地和耕畜，使无数农民濒于破产，阶级矛盾更趋向尖锐。国民党的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在蒙旗中划地设县，形成蒙汉旗县并存，分治对立的局面，大量的牧场放垦，严重地损害了蒙族同胞的牧业，民族矛盾也日渐加深。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蒙汉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南方工农红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塞外，给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反动派恐慌不安了。沿途都会看到新修的碉堡，一批一批被抓的壮丁。每住到一个村庄里，半夜三更里常常碰到查户口的，盘根问梢，翻箱倒柜。有时查出一块红布，都要追问半天，弄不好，还要当“共产党嫌疑犯”问罪。检查过后，有些大胆的人，就指着匪军的背影说：“红军没来，你神气些啥？人家一来，你不夹着尾巴跑才怪哩！”

若飞同志看到这些情况，更感到党的决策的英明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在归绥布置工作之后，很快地来到包头。为

了工作方便，他住到复成元街商贾云集的泰安客栈。晚上，在这个地区坚持工作的乌兰夫（云泽）同志，得到“交通”的联系以后，前来汇报工作。乌兰夫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和若飞同志就相识。为了躲过特务的耳目，也装扮成商人模样，来到旅馆。久别的同志在秘密环境中，一旦相见，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畅叙着革命战友的关切和问候。

“党派你来了，这太好了。我们盼了好久啦！”

乌兰夫同志热情地问候以后，汇报了这个地区的组织情况、民族工作、军事工作……之后，迫不及待地希望听到党的指示。若飞同志扼要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南方红军的革命战争，接着就传达党对这个地区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工作要求。他说：内蒙古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大汉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民族侵略所必然争夺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展革命力量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若飞同志接着说：要想在内蒙古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为此，就必须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在蒙汉群众中间，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团结互助，在地方的民族部队中，开展党的工作。

如何完成上述任务呢？若飞同志着重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是完成我们任务的极为重要的保证。我们必须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发动蒙汉各族人民，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积极参加各种斗争。

民族工作、群众运动、武装斗争，这是若飞同志传达党指示的中心任务，也是他来内蒙古工作的中心任务。

若飞同志为了贯彻党的指示，十分重视开展工作的布点工作。他首先提出一个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四十八合少^①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开展工作的布点工作，建立了工作据点。

开展武装斗争，是若飞同志最关心的问题，那时我们的一些蒙族同志已经在绥远的老一团——内蒙古蒙族地方部队中，进行着党的工作，若飞同志很满意地对乌兰夫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只要你们始终重视武装工作，抓紧不放，坚持下去，积蓄力量，将来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若飞同志关于党对内蒙古地区武装斗争指示的传达，给内蒙古的同志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蒙族同志中影响尤深。从那时起，内蒙古地区工作的一些同志，从来没有放松过武装斗争的工作。著名的百灵庙反对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变，就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之一。

为了和陕北红军取得军事上的联系，若飞同志还派人到陕北红军二十六军去联络，被派去的人带回了陕北红军发展的消息，大大鼓舞了内蒙古武装斗争的发展。

若飞同志根据布点工作计划，首先在包头一带，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他派同志在铁路沿线和大青山下组织群众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并亲自去五原一带检查工作，布置工作。不久，在包头附近，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锅厘运动”。愤怒的群众打走了收“锅厘税”的差役，他们高呼着：“谁要收锅厘税，就要砸碎他们的脑袋。”经过这次猛烈的群众斗争，锅厘税被迫暂时停收了。在火热的斗争中，若飞同志经常改换服装，深

^① 合少，蒙语就是旗，等于县。